聚 焦

混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

300分也能上“本科”?警惕社交媒体精准“钓鱼”

实习生 杨展仪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璟瑄
记者 樊未晨

正值高招接近尾声、高校开学前夕。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现，一些机构和个人用“全日制在校学习4年”“毕业获得本科学历”等话术吸引考生报名，并收取上万元的高额学费。

实际上，每逢这个时间段，总有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利用考生和家长的急切心理，散布各种虚假招生信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梳理了教育部十多年来的招生录取预警提醒，“利用不同教育类型，故意混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几乎年年被提及，称得上是蒙骗考生和家长的“重灾区”。“混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形式不断更新，话术同步迭代升级：从线下招生和电话宣传，到利用社交媒体来精准定位目标群体。

此“全日制”非彼“全日制”

今年高考填报志愿结束后，总分276分的河南考生张嘉文（化名）意外收到了来自湖北的几所本科院校的“入学通知书”。通知书上印着张嘉文的全名和身份证号，以及“经审核，你符合我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日制本科的入学条件”等字样，还用红色框重点指出“本校是教育部批准的具有高等学历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

张嘉文感到“莫名其妙”：在填报志愿时，自己从来没报过任何一所湖北的学校，也没想过自己的分数能上“全日制本科”。

通过社交媒体检索，张嘉文了解到，自己收到的并非通过填报志愿获得的普通高等教育本科院校“录取通知书”，而是自考本科助学班的“入学通知书”，“入学”后不能进行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新生学籍电子注册，这类学习经历毕业后获得的是“非全日制”学历，与通过统招录取毕业后获得的全日制本科学历差距很大。

同样收到某高校“入学通知书”的郭子轩（化名）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高考之后，某所高校的‘学长’来学校宣传招生，表示如果分数不够可以考虑这个学校。反正也不影响填志愿，我就先把自己的个人信息、住址、身份证号告诉对方了。”

郭子轩的高考分数在300分出头。收到通知书，看见“全日制本科”的名号，他的入学意愿十分强烈。不过，在与家里人一起查阅相关信息和未来升学路径之后，他意识到不对劲，最终选择去了一所志愿上的公办专科学校，打算毕业后再考虑专升本。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线下宣传，线上的社交媒体也成为许多自考本科助学班“隐秘”的招生阵地。

在小红书上，搜索“高考三百分”“在校学长”“自考本科”等关键词，会看到一些“高考二三百分，有没有搭子一起找学校?”“某某学校在读学长，欢迎感兴趣的考生来答疑解惑”等类似的评论。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点开这些评论的发布者主页后发现，表面上看似是考生或在校学姐的热心交流帖，实则是利用平台大数据算法推荐机制来吸引类似分数段考生用户加入讨论，以此来精准获得大量潜在的招生宣传对象。

实际上，教育部每年在高招季前后都会发布谨防考生和家长上当受骗的预警。

在教育部今年6月27日发布的预警中，专门提到了这种混淆不同教育形式的虚假招生宣传现象：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故意混淆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区别，以自考助学班、网络教育班、国际合作办学等入学通知书蒙骗考生及家长。部分办学机构打着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幌子，实际招收其他教育形式的学员。此外，部分由中介公司、社会人员运营的招生账号借助网络平台发布信息时，常常以“免试入学”“免学费”“包分配”等噱头进行虚假宣传，夸大就业前景、升学率，误导考生和家长。

招生话术文字素材。 受访者供图

辅导班也有了“全日制”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联系到一名发帖介绍自考本科的用户，对方表示自己提供“正规全日制自考本科助学班”。在被问及具体学习形式时，对方介绍助学班是“全日制在校读4年，享受所有学校的资源和环境，一年包含学费（在内的）所有费用共两万元，最后拿到的是自考本科的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毕业就是本科学历。”而当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主动询问“学历是否属于全日制学历”时，对方才澄清是“非全日制”学历。

“千万要避雷打着‘全日制’幌子的助学班。”“能走统招志愿就尽量走，助学班只是自考本科的辅导班，毕业后也不是全日制学历!”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注意到，在一些咨询“入学通知书”或自考本科助学班相关的询问帖下面，有上百条用户评论对某些机构宣传的“全日制助学班”表达不满，称其故意把“全日制”的学习方式与最终获得的“全日制学历”进行混淆，企图“挂羊头卖狗肉”，蒙骗一些对教育形式并不了解的考生和家长。

“我们在宣传时一般会强调‘全日制教育模式’——因为大部分学生是分不清全日制学历这个概念的，以为只要全天在学校待着就是全日制。”来自重庆某高校的大学生杨菲在大二期间曾做过某自考本科助学班机构的“电话招生员”。她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展示了自己拍摄的一页文字素材，上面详细写明了与考生和家长电话沟通时该说什么、怎么说，一些“重点内容”还被画上标记和补充，例如“能和统招本科的同学一起上课”“毕业后拿本科学历”等。

杨菲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机构的要求是，学生和家长不问的就不说，只说‘好’的，说这个是本科学历，可以考研考公，考上之后和高考志愿的本科没有区别。但如果要看毕业证，就露馅了，因为毕业证上写的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全日制就是全日制，自考就是自考。”对于许多机构和个人在招生时有意玩“文字游戏”，模糊毕业后学历形式的行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机构应当清晰表明自己的学历形式，将教育的选择权充分留给考生和家长，而不能故意诱导和隐瞒。

冒充“招生办”成功招入一个学生能提成500元

“感到自己的良心受到了谴责。”今年暑假，来自湖北的大一学生吴晓彤（化名）选择了一份某自考本科助学班机构招生的兼职工作。一开始，她以为只是给考生打电话，介绍学校信息。但当一本厚厚的话术宣传册发放到自己手里的时候，她便感到有些不安。

吴晓彤告诉记者，在话术手册中，考生的教育背景、详细联系方式、家长的不同性格特点和应对方案被事无巨细地列举出来。在电话交流中，要根据对方的具体情况，鼓励一些叛逆的考生远离家庭、独立于家长规划的道路，或是利用家长的虚荣心、对孩子的高期待，告诉家长本科学历的重要性……

“在手册里，混淆学籍和毕业证的话术表达被重点画上了标记。我们主要就是模糊家长的问题。但事实上，来这上学根本就不可能拿到本科毕业证，自考本科最后只有考籍，没有学籍。”吴晓彤说。

吴晓彤说，助学班的招生电话员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当时她所在的办公地点还有200多名电话员，有的来自其他大学，也是暑期兼职，但更多的是应届生，甚至有高中还没毕业的未成年人。“由于其他暑期兼职不招收未成年人，他们就来到这里打电话赚钱。自己都还没有参加过高考，却来这里冒充学长学姐，我真的感到很震惊。”由于实在无法说服自己做这类工作，吴晓彤只干了两天便匆匆离职。

杨菲则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透露，当时的办公环境是一个“位置很偏的平房，摆了很多临时的桌子和椅子，每天一开门就看到一群人以‘某某大学招生办’的名义在打电话”。她还提到，机构每天会给自己提供一张电话单，上面都是从不同渠道“购买”来的学生和家长的各项联系信息，“一条10-15元，一个学生的未来可能就被买断了”。

此外，杨菲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助学班一年的学费是19800元，如果招生电话员成功招入一个学生并且在一个月内没有退学的话，就能提成500元。

为了招揽更多的学生，电话员和学生需要每天在线上聊天，甚至帮忙在购物软件上砍价，“关怀无微不至”，直到学生入学为止。“有的电话员甚至和学生谈起了恋爱，利用学生的感情，增加入学的概率。”杨菲说。

在储朝晖看来，大量学生和家长的信息泄露问题需要教育系统进一步严格监管，杜绝个人信息买卖。对于机构和个人利用国家正规自考本科的教育形式“钻空子”的乱象，储朝晖表示，在政策上应该提出刚性要求，“可以宣传自己的助学班，但是必须把自己的实际身份、学习方式和毕业学历等信息说清楚”。

与此同时，储朝晖也提醒考生和家长，收到类似“入学通知书”或是其他声称高校招生人员的线上信息也要增强分辨能力，如果无法自行判断真伪，可以优先咨询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

书香暑假

①近日，山东枣庄，小朋友在鲁南书城阅读。 视觉中国供图

②近日，山东青岛，孩子们在李沧区世园街道上流佳苑社区书店阅读。 视觉中国供图

③近日，北京市民在三里屯三联书店阅读。 视觉中国供图

专家视野

高等教育从“宽出”到“严出”的转型突围

□ 李志民

中国高等教育用24年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近百年的发展历程。1999年启动的扩招政策，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00年的12.5%跃升至2002年的15%，正式进入大众化阶段；至2023年，这一指标突破60%，标志着我国全面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新常态。

当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再至“普及化”，其核心功能已从选拔少数精英转向培养多样化人才，教育理念、管理模式与评价体系也要“与时俱进”，特别是“严进宽出”较快地从总体上变为“宽进宽出”之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面临全新的“严出”挑战。

破解“严出”困境，构建“入口宽松、过程严控、出口多元”的闭环体系

部分大学生“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的阶段性异化，折射出教育生态的深层矛盾。一些人由中学阶段的“内卷”压力转变成大学阶段的“躺平”心态，造成学习的主动性不够。这种“入学即解放”的集体认知，根源在于制度设计未能形成有效激励——缺乏过程性评价机制导致学习动力随入学而衰减，课堂参与度低、考试临时抱佛脚等现象屡见不鲜。

“严进宽出”与“宽进宽出“的交织进一步加剧矛盾。有媒体曾以《大学生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为题，针对大学生自主学习时间过少，导致大学生活日趋“高中化”现象，指出国内高校大学生沿袭高中阶段的超负荷学习时间总量过长，大学生课内外学习时间总量及结构呈现“高中化”特征。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学校发现部分学生存在“代课”“代考”等学术不端行为，并形成灰色产业链。

社会期待与教育现实的错位，形成“鸡娃式内卷”与“躺平式放纵”的畸形并存。事实上，在精英教育阶段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基本上是包分配或岗位选择多，那只是在每年毕业大学生低于百万人的年代，而如今每年毕业大学生超千万人。

破解“严出”困境，需构建“入口宽松、过程严控、出口多元”的闭环体系。通过制度创新激活改革动力，以治理创新提升办学活力，借产教融合增强服务能力，中国高等教育方能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战略转型。

完善质量把控制度，将外部需求转化为内在动力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以学位分级制度为核心，构建了精细化评价体系：本科成绩按课程权重计算，这种设计使学习成效具象化，形成持续激励效应；市场层面，学位等级直接决定深造与就业机会；社会层面，学位等级与职业起点强关联。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俄罗斯等也有类似的制度设计。

该体系通过制度设计将外部需求转化为内在动力，实现“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中国高校可借鉴其“过程性激励+结果性应用”模式，结合国情探索创新试行“学位+荣誉等级”制度，让真正努力的学生拿到荣誉证书，获得社会认可，调动学生学习的内生动力。

当前一些高校普遍采用的绩点（GPA）评价体系已异化为“内卷加速器”，一些学生为0.01分的差距选择“给分高”的“水课”，为刷绩点放弃真正感兴趣的课程。针对这一问题，北大、清华等头部高校已展开探索。例如，北大自2025级本科生起全面取消绩点，采用等级制评价，并允许学生选择1门课程以“合格制”记载成绩，扩大探索空间。清华早在2015年便以12档等级制取代GPA，复旦、上海交大等校也推行“等级制+综合评价”模式。试点效果显示，学生用于记忆性学习的时间减少，更多精力投入科研和兴趣领域。

取消绩点仅是第一步，但已显现积极变化。总之，高等教育质量提升需构建外部压力与内在动力的平衡机制，通过评价制度改革推动教育生态重构，最终实现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发展的战略转型。这一体系通过制度创新激活改革动力，以治理创新提升办学活力，借产教融合增强服务能力，推动高等教育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为教育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重塑个体成长、院校生态与产业升级

这场高等教育领域的结构性变革，既是教育理念的根本性突破，更是支撑国家现代化的战略抉择。当“宽进严出”取代传统模式，当发展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跃升，这场教育革命正在三个维度释放深远价值：

对个体而言，转型彻底打破“一考定终身”的制度壁垒。通过构建终身学习立交桥，每个学生都能获得个性化成长方案。学分银行制度让不同阶段的学习成果可积累转换，职业资格与学历教育的双向认证机制，为技术技能人才开辟了更宽广的上升通道。这种制度创新真正实现了“人人皆可成才”的教育愿景，让每个学习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节奏。

对院校而言，转型催生特色发展的新生态。研究型大学聚焦原始创新突破，应用型高校深化产教融合，职业院校强化技能传承，分层定位有效破解同质化困局。分类发展精准对接区域产业需求的人才供给，带来地方本科院校校企合作项目增长，毕业生留当地就业率提升，等等。

在国家战略维度，“宽进严出”改革通过重构课程体系，既保障人才数量供给，更实现质量跃升——毕业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显著提升，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这种人才红利不仅填补产业缺口，更通过创新动能释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核心驱动力。

这场质量革命需要以更大的改革勇气突破利益固化藩篱，以更智慧的系统设计构建质量生态。当每个学习者都能找到适合的成长路径，每所高校都能彰显特色优势，每个产业都能获得精准人才供给，当政府、高校、社会形成改革合力，中国高等教育必将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质量提升之路，为教育强国战略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

探 索

打破学科壁垒，文科生也学算法

西安交大探索“AI+传播”人才培养新路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黄 博

2025年秋季学期开学在即。在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以下简称“新媒体学院”）2025级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智能传播方向）本科新生的课表上，智能编程与AIGC视听媒体实践相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智能传播导论被排在同一天。

这种“文理混搭”的学习是该专业新生的日常。西安交大新媒体学院副院长、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孙鹤立介绍，这是学校新媒体学院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构建“通识课+专业课+技术课”三维课程体系的一项举措。

当ChatGPT掀起全球人工智能浪潮，当AI成为各大媒体标配，传媒行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智能化变革。

“AI时代培养什么样的新闻人?”西安交大新媒体学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瞄准智能传播前沿领域，推出“培育人文精神 启发数智思维 直面行业需求”的本硕博贯通式智能传播人才培养体系，致力于培养既懂新闻传播规律、又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新文科”复合型人才，探索未来传播人才的培养新范式。

孙鹤立介绍，这一人才培养体系自2019年起开始探索，经历了从理念设想到课程落地的艰难过程。对教师而言，不仅要突破传统授课思维，还需具备跨学科知识储备；对传统单一学科培养体系而言，则面临着课程重构与评价标准重塑的挑战；对学生而言，既要适应高强度的跨学科学习，也需在技术与人文间找到平衡。难点在于如何真正实现技术与传播的深度融合，而非简单的课程叠加。

“打破学科壁垒，文科生也学算法”是这一体系的特色之一。据介绍，这一体系不仅要求学生掌握新闻传播学、舆情分析等传统核心课程，更需攻克Python数据分析、自然语言处理、AIGC内容生成等前沿技术课程。为此，学院与计算机学院联合开设智能新闻生产实训、数据新闻、人机交互与用户行为分析等前沿特色课程，实现了AI与新闻传播教学深度融合。这种双向的能力重构，使得智能传播教育远非简单的文理课程叠加，而是一场涉及认知方式、思维模式和教育范式的深层变革。

面对新闻传播行业传统从业者供给过剩，而掌握智能传播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严重短缺的现状，新媒体学院采取“双师同堂”的创新教学模式——部分核心课程由一位文科教师与一位工科教师共同执教，从课程设计到考核评价实现深度协同。学生提交的作业需同时接受“技术实现”与“人文价值”的双重评估，确保人才培养既具备技术前沿性又坚守人文科学性。

该校新媒体学院2024级博士生郭沛豪表示：“在一门课里同时学习智能传播的价值逻辑和技术路径，不仅能掌握算法工具，还能引起我对技术背后社会意义的思考，这种跨学科碰撞正是智能传播研究的魅力所在。”

立足“人工智能+传媒”的文工交叉人才培养是这一体系的另一个特色。

今年，在西安交大创新港校区新增的1500平方米教学空间内，“空间媒介与智能计算实验室”正式落成。据悉，该实验室立足“人工智能+传媒”新业态，通过强化与行业龙头企业、地方政府和文化机构的校企合作，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联合体，建设科研成果转化中心，开发空间媒介与智能计算在未来传播、智慧城市、元宇宙体验、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等领域的创新应用场景，推动实验室技术成果的商业化应用，打造示范项目。

智能传播系还依托千万级中文语料库和两万余部智能传播领域教材资料，构建了全国首个新闻传播类教学大模型——“慧传”。据介绍，“慧传”自2025年上线以来，始终定位于“教学增强工具”，目的是让老师更好地教、让学生更好地学。对学生而言，它是一位“永不疲倦的实训陪练”；对教师来说，它化身“超级教研助理”。

“使用‘慧传’大模型后，最大的感受是学习变得更立体了。”该校新媒体学院2024级硕士生吴家若分享，“它就像一个既懂技术又懂传播的超级助教，不仅能快速解答专业问题，还会引导我们思考技术背后的人文价值。这种AI辅助学习的新模式，让我们在掌握硬技能的同时，也培养了批判性思维。”

锻造“技术+传播”的桥梁型人才是这一体系的最终目标。

一手抓代码，一手抓报道——新媒体学院独创的“双脑”复合型培养模式，打破了传统新闻教育的单向度路径。这一模式通过“技术-传播”双轨并行的课程体系，让学生同时获得两种核心竞争力。

据介绍，为实现桥梁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学院构建了“平台筑基+项目驱动+行业对接”的立体化实践育人体系：12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与中央级媒体等共建的43个产学研基地，让技术赋能内容生产，打造“育人-用人”的快车道。